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

彭青龙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英语系, 上海 200023)

摘要:近20多年来, 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白人文化、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多元文化狂欢”景象。本文以彼得·凯里等代表性作家的小说为切入点, 结合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 多视角解读这一文学奇观, 从而彰显其深植于文本之中的政治隐喻。

关键词:殖民历史; 白人文学; 移民文学; 土著文学; 文化身份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Postcolonial Context

PENG Qing-long

(English Departmen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200023,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re has appeared “multicultural carnival” of white culture, immigrant culture, and aboriginal culture in Australian literary world. This paper, applying post-colonial cultural theories to novels of representative writers like Peter Carey's, etc, is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this unique literary phenomenon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revealing political metaphors embodied in texts.

Key words: colonial history; white literature; immigrant literature; aboriginal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20世纪80年代, 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给当代澳大利亚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 悬而未决的文化身份被重新书写, 游离于文化边缘、倍受歧视的移民族群奋起呐喊, 被赶出家园的土著居民似乎踏上了回家的征程。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 澳大利亚小说界呈现出审视殖民历史和民族叙事的回归, 白人作家、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凭借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创作出许多揭示当代澳大利亚人生存困境的经典名著。本文以彼得·凯里等代表性作家的小说为切入点, 结合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 勾勒出一幅当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狂欢”的生态景观, 并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解读, 彰显其回归历史本真性、建构文化身份的政治隐喻。

1. 审视殖民历史、回归民族叙事的白人文学

对于被殖民者来说, 殖民历史是不堪回首的过去, 民族叙事是一部充满辛酸的血泪史。

然而, 历史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绕过的, 即使是政治上获得独立的民族在建构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属性的时候, 也难以摆脱对殖民主义的依赖。虽然他们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批判的态度, 着力建构一套一眼就看得出是属于本土的, 至少其表征是有别于帝国意像的民族叙事, 他们也无法完全清除内化于被殖民者灵魂深处的文化价值观, 无法排解帝国长久铸造的劣等民族的自卑情结。这就注定了“去殖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意味着建构独立的民族叙事是一个浩瀚而艰巨的工程。

建构自我属性的民族叙事关键在于“对一个民族进行想象”和对帝国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彻底的清算。艾勒克·博埃默[1: 211]认为: “民族是一种社会建构物, 是一种在象征层面的构成, 而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存在。它存在于建设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心底, 存在于公民、士兵、报纸的读者和学生等对它的体验和感

受。因此，任何一个新的独立实体——也许有人还要说，在争取独立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都需要这个民族国家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重新加以建构；或者说，让这种属性化作新的象征形式。”但是，任何新的象征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化传统，即便是受殖民统治“污染”的传统。这就要求民族主义者或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作家，要从自己的文化源泉中汲取灵感，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再现其民族叙事，用小说投射出独立的自我属性，重新创造新的文化传统，或对旧的历史做出新的阐释，使被帝国文本所掩盖的、歪曲的本真性得以重见天日。而正是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继承与超越的过程中，使我们看到了话语权力的消解与转换，新旧文化体系的重生和消亡。

然而，殖民地作家因语境的差异而对殖民历史采取了四种不同的态度。其一，默认，即对帝国历史毫不怀疑，承认殖民地是文明的边缘地区，承认文明进入被发现荒地的帝国记载，殖民地的历史是宗主国的延续；其二，摒弃，即拒绝承认任何与欧洲中心话语的关联，以及帝国文化对殖民杂交文化形成的影响；其三，插入，即接受历史叙事的基本前提，但在历史的记载中插入更直接、更真实反映后殖民生活的“反叙事”；其四，篡改，即体现最有效的后殖民对立性，并使其自身成为一种主导后殖民话语的方式[2: 196-8]。这种认知态度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各国“去殖民化”的进程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在“被迫流放和受囚禁”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国家的澳大利亚[3: 286]，对帝国的殖民历史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在帝国的文本中，澳大利亚的历史从库克“发现”澳洲大陆开始的，土著人无权拥有历史——土著人的过去、反抗白人入侵的游击战、被屠杀和被驱逐的史实都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英国的国王和女王执政的年代”[3: 298]。早期的澳大利亚白人虽然受到帝国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视为“他者”而流放到远离伦敦的南半球，

但他们依旧心系母国，默认澳大利亚历史是英国光荣史篇中的一章。即使在民族主义兴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者独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依然怀着难以割舍的英国情结，“去殖民化”的进程受到“帝国向心力”的延缓。也正源于此，澳大利亚人一直倍受文化身份的煎熬，历史成了他们无法走出的过去。

事实上，自1901年独立以来，澳大利亚人一直致力于民族叙事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从讴歌“伙伴情谊”的劳森派现实主义小说，到注重心理刻画的怀特派现代主义小说，无不表现了澳大利亚白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澳大利亚民族想象力的核心——菲利普斯的‘民主主题’、与土地的冲突和由殖民地向国家独立转变”[4: 275]。虽然劳森派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受到抨击，被称之为“沉闷乏味的新闻现实主义”小说[5: 338]，但其作品中所张扬的“反权威精神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融合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特色的怀特小说是“怀特对澳大利亚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做出的最新贡献”，代表着澳大利亚的“精神成熟——从与环境冲突到驯服环境”[4: 276]。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劳森派和怀特派小说大多集中描写“白人神话”，对于澳大利亚原著居民的生活鲜有叙述，即使有部分内容涉及土著人，也往往被塑造成“他者”形象，未能触及到澳大利亚的“民族之根”和“历史之源”。因此，建构民族叙事和文化身份的伟业尚未完成。

20世纪70-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化民族主义飓风”[6: 239]，涌现出重新审视殖民历史和民族叙事的潮流，一批探讨“民族之根”和“历史之源”的“新历史”小说纷纷出炉[7: 304-12]。它们通过历史的碎片，如趣闻轶事、意外的插曲和奇异的话题等，去修正、改写和打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文化代码，并在权力和话语的网络中看其人性的扭曲或生长，最后使主体的精神扭曲和虚无成为自我身份的历史确证。这些“新历史”小说承载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和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使被压制、被边缘化的族群重新回到话语空间，并在历史的“多重奏”中恢复他们应有的声音。它们或揭露了流放犯制度的腐败与罪恶，如罗德尼·霍尔的《延德雷三部曲》（1988-1993）；或再现了内德·凯利的民族神话，如罗伯特·德鲁的《我们的阳光》（1991）；或将土著人的历史融入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如戴维·马洛夫的《伟大的世界》（1990）；或通过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揭穿了帝国关于“文明传播”的历史谎言，如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等。尽管这些小说视角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从不同层面讲述了土著人、足迹专家、流放犯、开拓者、丛林汉、战俘等历史小人物的故事，而正是这些不被帝国历史记载的普通人的故事，使人看到了充满谎言的殖民历史和帝国权力运作的范式，本真的民族叙事也在这种解构过程中被重新确立了起来。

彼得·凯里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一个力证。作为因两获“布克奖”而在“国际文坛享有极高声誉的文学巨匠”，^①凯里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包涵着很强的传统道德观和政治视野”。在已出版的八部长篇小说中，五部都和帝国殖民史相关，从《魔术师》（1985）所展现的历史谎言和民族困境，到《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英国基督文化与澳洲土著文化的冲突；从《杰克·迈格斯》（1997）马格维奇文化身份的重塑，到《“凯利帮”真史》（2000）殖民神话的再现；从《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1994）的帝国文化霸权，到《幸福》（1981）里的“美国梦”，无不体现彼得·凯里“写回”旧殖民帝国——英国和新殖民帝国——美国的倾向。“写回”并不是“重写”，而是比尔·阿什克拉傅特提出的“篡改”。“重写”只不过在“多重奏”中加入了“甄别的声音”，而“篡改”则改变了“元叙述”本身。“写回”的效果比“把故事掰正”更深远[8: 110]。彼得·凯里最优秀的作品融合了维多利亚的宏伟气势

和澳大利亚的乡土气息，并折射出作者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现审视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

“写回”帝国中心或对历史进行“正本清源”就意味着对充满谎言的帝国话语进行必要的修补，而对历史的修补，正是把一个民族成熟的过程叙述出来，是控制和确立自我属性的表现。艾勒克·博埃默[1: 244]认为：“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有了历史和历史的叙述，他们就获得了进入时间的入口，他们被表现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代澳大利亚小说家将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就是对历史进行修补，并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建构历史，从而重新掌控自己民族的命运。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和亚历克斯·米勒新近出版的《石乡之旅》（2002）是有关白人文化与土著文化冲突、交融的寻根之作，所不同的是《奥斯卡与露辛达》再现了帝国远征时期白人文化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破坏，而《石乡之旅》则讲述了当代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人从冲突到和解的故事。彼得·凯里与亚历克斯·米勒分别从历史与现实的豁口进入民族想象的核心，刻画了当代澳大利亚白人社会寻求与土著民族和谐相处的愿望，从屠杀、驱赶土著居民到愧疚、和谐共荣，从掩盖历史的真相到颠覆历史文本、再现民族神话的本真性，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正一步步为建构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殖民国家，虽然它没有像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遭受被占领和奴役的命运，也没有像美国、印度那样经过民族战争而获得独立的经历，但澳大利亚人一直为寻求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所困扰。于是，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审视殖民历史、建构民族叙事的回归。它是澳大利亚社会由单一白人文化到多元文化转型的一个断代文学景象，其实质是建构独立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这些承载着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民族叙事似乎在历史记忆中找到了归属，并

^① Anthony Hassall, "Preface" in *Dancing on Hot Macadam*,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8.

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虽然白人文学似乎在自我属性的确定中找到了出路,但由于它与英帝国之间特殊的历史文化关系、与土著文化的各种冲突和对美国文化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注定了澳大利亚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所幸的是澳大利亚作家已在历史和现实间找到了契合点,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与亚历克斯·米勒的《石乡之旅》可能成为当代澳大利亚白人小说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它预示着澳大利亚民族从幼稚走向成熟,并为拥有独立的文化身份扫清了道路。

2. 游离于两个世界的移民文学

当代澳大利亚白人作家似乎从历史的记忆中找到了归属感,而非英裔澳大利亚移民作家似乎仍在重复着早期白人移民殖民者的古老故事——在新旧世界中游离、挣扎,所不同的是早期英裔移民作家及其后裔已成为新殖民话语的主导者,而当代澳大利亚移民作家——少数族群的文化代言人却要为自己的话语权作斗争。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将归向何处?这些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是陷于错位之后的少数族群的共同困惑,也是非英裔移民作家经常着力探讨的主题。

移民作家的归属困惑主要源于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文化身份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也有外在的矛盾性与对抗性。统一性和连贯性指的是具有族群性的“真实的自我——共同的历史和祖先”。外在的矛盾性与对抗性指的是“我们到底是谁或我们将变成什么样”,即与别人相比而存在的“巨大而深刻的差异性”[9: 110-12]。由于移民作家往往是离开故土、寄宿他国文化的旅居者,所以对于寄宿国而言,其身份的外在表现只能是“巨大而深刻的差异性”,是寄宿国文化的“他者”。虽然移民作家的作品穿越非常广阔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空间,充满不同哲学的张力,但其内容往往包含着相互对立的社会行为和文化冲突。这种既不属于母国也

不属于寄宿国的身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内心的迷失和异化感。因此,移民作家变成了“没有锚,没有地平线,没有色彩,没有国家,没有根的个体——一群天使的族类”[10: 218]。

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早期的英裔移民作家与非英裔移民作家对归属感的认知和感受也存在着差异。前者基本上把自己看成是英国文化的迁徙者,只具有“相对他者性”。后者寄宿于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是地道的“他者”。前者“承载了英国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在教育、文学、宗教活动、文化准则及各种体制等方面给人以英国驻外代表的印象”[1: 246]。全新的环境——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家园根基,使他们没有此时此地的归属感,这种迷失一直持续到澳大利亚独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帕特里克·怀特说,他从小就有一种与澳大利亚的现实总是隔一层的感觉。“只有英国人才是对的”成了他从小到大的座右铭[1: 246]。托马斯·基尼利也说,澳大利亚人“被教育成了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异乡人”[1: 246]。而后者出生在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亚洲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等,或非英语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希腊、德国、波兰等,这些移民作家用双语写作,在主题和政治视野上保持着与故土文化的各种联系。环境、语言、文化、价值观对他们而言都是全新的,其对身份迷失的感受更深更切,渴望被主流白人社会接纳的愿望也更强烈。

然而,从异化到本土化,从边缘到主流,移民作家需要逾越很多障碍,首当其冲的是语言障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同质化的工具。为了适应新的水土,融入主流社会,移民族群必须学会忘记母国语言,转而使用英语与主流文化对话。但是多数移民对于自己的母语怀有深深的眷恋,而对澳大利亚英语有着一种天然内化了的抵制。于是刻画移民族群的“语言异化”现象经常出现在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如波兰裔作家玛丽亚·利未特的自传体小说《十二月没有下雪》(1985),希腊裔作家安提戈涅·卡法拉的《亚历山亚》(1984)和尼古

拉斯·亚大纳叟的短篇小说集《卡皮泰恩·尼古拉》(1982),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移民家庭因语言的不通而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令人尴尬的窘境。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患了“失读症”,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无法与人交流。也正由于此, 他们往往显得无所适从, 甚至愤怒, “这不是他的错, 他从来没想过要来到这该死的国家, 他不会说英语, 那又有怎么样呢? 他们能说希腊语吗?” [11: 190]。

如果说带来隔阂和寂寞的“语言异化”是移民生存困境的表征, 那么造成文化冲突和生活混乱的“文化异化”则是移民生存困境的本质。移民作家通过刻画爱情的悲剧、婚姻的不幸、家族的矛盾、邻里的不和及事业的挫折等来展示移民生存错位后所带来的心理震荡。例如在《牛奶和蜂蜜》(1984)里, 作者伊丽莎白·乔利采用歌特式的传统叙述和时空倒错、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 刻画了主人公雅各布因陷入两种文化的旋涡而导致精神分裂: 一方面, 他极力维系着欧洲带来的文化传统, 但“在新的土地, 他们像散落在地的石块, 没有融入土壤”; 另一方面, 他又十分厌恶这个“奇怪的新家”——一个充满暴力、乱伦和家庭秘密的地方。他渴望逃离这个“自我流放的家”, 然而又无处逃遁[12: 37]。最终他一把火烧毁了既爱又恨的“家”, 但也未能结束自己被“囚禁”的生涯。

雅各布的遭遇几乎可以在亚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的小说《漂泊者》(1983)中找到。对于远离故土的亚洲移民来说, 新家本应是温馨的地方, 实现梦想的地方, 却成了精神断裂的场所, 自我流放的场所。即使在新家生活了一百多年, 也无法在新的土壤中落下根来, 移民族群成了地地道道的漂泊者。作者通过两位不同年代的叙述者——罗云山和希莫斯, 讲述了澳大利亚华人生活错位的痛苦经历, 恰如小说主人公希莫斯[13: 468]所说: “我突然明白我的感觉与120年前罗云山的感受一模一样。”时光可以流逝, 但生活错位的痛苦却一直延续着, 两个相距一个多世纪的世界是同一个世

界, 罗云山和希莫斯的生活体验正是千百万移民者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 伊丽莎白·乔利和布赖恩·卡斯特罗所揭示的生存错位和身份认同也是困扰着澳大利亚人的普遍问题。虽然澳大利亚白人已经在澳洲大陆生活了一百多年,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与英国、美国和亚洲国家关系的变化, 澳大利亚人的文化身份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斯图亚特·霍尔[9: 110-12]认为: “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也是‘转化的’。它既有过去, 又有未来。它并非是业已存在的, 能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 而是具有历史性的, 并处于不断转变之中……处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相互作用之中。”霍尔的观点反映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后殖民现状——一方面, 澳大利亚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正在被重新审视和阐释, 并赋予新的意义; 另一方面, 影响建构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各种外在力量也正在此消彼长, 英国势力的减弱, 美国及亚太国家力量的增强, 都会对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转化产生直接影响, 这种内外因素的变化被作家们适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主流白人作家纷纷把眼光投向与澳大利亚相邻的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 出版了许多反映东方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化冲突、融合的小说, 如布兰奇·德阿尔普杰的《龟滩》(1981)、亚历克斯·米勒的《祖先游戏》(1992)、彼得·凯里的《我的生活如同骗局》(2003)和雪莱·黑茨阿德的《熊熊大火》(2004)等。在这些作品中, 《祖先游戏》无疑是描写澳大利亚错位文化最为成功的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刻画几位澳大利亚移民, 尤其是华裔澳大利亚移民凤家四代人的生活经历, 以及异国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化的冲突, 反映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祖先情结”。凤家的第三、四代子女都有强烈的叛逆心理, 鄙视祖先的一切, 崇尚“欧化”。凤四甚至烧毁象征祖宗的家谱, 并把代代相传的宝镜扔进钱塘江, 以示与祖先文化决裂。但凤四并未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接受, 成了没有“根”

的弃儿。小说准确描绘出人们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的努力和错综复杂的精神感受，并通过子孙与祖先之间的关系，暗示了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特殊情结。一方面要摆脱英国影响的愿望随着其自身的强大而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那种典型的祖先与后辈之间若即若离拂之不去的感情，使得它难以彻底斩断与英国的联系，而此矛盾的民族心理也许还会继续下去[13: 459]。

移民作家和白人作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聚焦错位文化，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多元混杂的本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更加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从《危险的岁月》里所表现出的欧亚文化归属困境，到《牛奶和蜂蜜》所刻画的“自我流放”的精神折磨；从《漂泊者》中所描写的无根飘零的痛苦经历，到《祖先游戏》里所揭示的挥之不去“祖先情结”，当代澳大利亚人正苦苦挣扎于历史与现实、新旧文化的两个世界之中。他们既要忠于本土，谋求与土著文化的和解，又要遵循英国人的传统；既要直面美国的文化霸权，又要应对东方文化的崛起，这种非此非彼的文化属性也许正是澳大利亚“混杂”多元文化的本质特征。“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取决于这样的共识：澳大利亚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洲和美洲，而是集中体现这三大洲最好现代特点的国家。”[6: 236]

3. 居住在欧洲都市文学传统边缘的土著文学

然而，“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有特点的真正发源地是擅长于口头表达的土著文化”[1: 251]。这一点可以在新编著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中得到佐证。^②虽然土著民族的口头文化对于当代澳大利亚人来说只具有文化本源的象征意义，土著后裔也多用英语而不是土著语言来展现其民族文化的本真性，但是土著文化至少是，也应该是确定澳大利亚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殖民

主义的语境下，澳大利亚白人文学出现了重新审视民族叙事、谋求与土著文化和解的趋势，土著作家也通过其文学作品来书写被白人侵占和奴役的民族血泪史。

自1788年首批英国白人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登陆以来，澳大利亚土著文化遭受了万劫不复的破坏。这些在英国被视为“二等公民”或“他者”的流放犯，摇身一变，成了澳大利亚新的主人。他们屠杀了在澳洲大陆上过着捕鱼狩猎原始生活的大部分土著居民，撕裂和肢解了具有四千年文化传统的土著文明，并把他们驱赶到内陆的森林里或边缘地带。从此，他们在帝国的话语空间没有了立足之地，并一直“缺席”和“失语”了200多年。虽然土著人也曾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他们无法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在强大的帝国文明面前，他们或被同质化，或被边缘化，彻底丧失了“主人公”的地位。

英帝国为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寻求理论依据。在帝国的意象和文本中，“不列颠是世界上所有自治民族中最伟大的民族”，“是上帝亲选的女儿”，肩负着在世界其它地方传播“自由、正义和人类精神”的责任。[1: 36]他们是文明的使者，为落后地区带来光明。被殖民者总是被贴上次等公民的标签[1: 90]：“不那么像人，不那么开化，是小孩子，是原始人，是野人，是野兽，或者是乌合之众。”英国殖民统治的目标就是“使本土人文明化”，于是他们“一直非常起劲地在白人统治的世界里复制着自己的形象”，并通过国家机器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实行“同质”化殖民统治[1: 30]。

“同质”化殖民统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迫使被殖民者使用统治者的官方语言，否则他们就会变成“失语者”。比尔·阿什克拉福特[14: 39]认为：“在后殖民话语中有三种语言类别：单语、双语和多语。单语对应的是移民国家，尽管使用中有差异，但英语是唯一通用的语言。”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英语是统治者的官方语言，土著居民如果想表现自己的民

^② 见新近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Laurie Hergenha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88; *The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族文化必须通过柯林·约翰逊所说的“白人的形式”来实现。弗朗兹·法依在其影响重大的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谈到欧洲黑奴时说[15: 34]:“不管愿意不愿意，黑人不得不穿着白人为他们缝制的衣服。”法依的作品虽然讲的是欧洲黑人的生存状况，但与澳洲土著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正如罗伯特·阿里斯所言[11: 205]:“土著话语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象征形式的压制。他们若要进入公众视野就必须采用这一形式。”于是英语就成了他们展现其“土著性”的唯一语言。

由于土著人受到澳大利亚白人的种种压迫，所以表现土著人反抗白人控制，跨越白人边界和围墙，就成了柯林·约翰逊、阿尔奇·韦勒、埃里克·威尔莫特、莫尼卡·克莱尔等土著作家着力探讨的主题之一。柯林·约翰逊的小说《野猫掉下来了》(1965)是第一部土著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位19岁土著青年在白人社会的遭遇。他试图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但由于肤色和家庭背景，其努力屡屡受挫，并多次被警察投入监狱。小说一方面凸显了土著人渴望被社会认可和平等对待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监狱是白人实施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在监狱里，土著青年丧失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而这正是殖民者所期待的结果。然而这种表面的“臣服”并不意味着控制与反控制、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结束，土著青年与白人警察的冲突实质上是土著文化与白人文化在澳洲大地激烈碰撞的缩影。其它表现类似主题的小说还包括约翰逊的《萨达瓦拉万岁》(1979)、《沃拉迪医生的承受世界末日的良方》(1983)，阿尔奇·韦勒的《狗一般的日子》(1984)，埃里克·威尔莫特的《彭莫勒韦：彩虹战士》(1987)和莫尼卡·克莱尔的《卡罗布赖安：一个土著女孩的故事》等。

随着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深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土著民族的自我意识开始增强，表达郁积内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身份的土著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繁荣起来。虽然他们继续刻画白人与黑人不平等的关系，描写土著人

抗击白人殖民统治的事迹，但更多地通过再现土著民族的历史、神话和传奇，来揭示白人的文化霸权和土著民族的身份危机。1988年，澳大利亚反英两百周年纪念不仅触动了白人的民族记忆，也引起了土著人对逝去的殖民历史的反思。“回归土著性”，“重建反话语”成为土著作家的主流，斐斯·班得勒的《威姿，我的兄弟》(1984)、阿尔奇·韦勒的短篇小说集《回家》(1986)、萨利·摩根的《我的位置》(1987)等都是探讨“重温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小说。其中《我的位置》被誉为“澳大利亚经典作品”[11: 226]，代表了土著小说的最高成就。

《我的位置》是一部寻找家庭、祖根和土著人审美感受，昭示现代白人文明对土著文化带来威胁的自传体小说。摩根对于自己孩提时期的考察，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多层次的叙述。小说里的故事由不同的家庭成员讲述，这也就满足了重构土著人历史的需要，即尽可能多地对土著人的过去做出种种不同的阐释。由于年代久远，主人公萨利的家史都已湮不可考，于是她和母亲便开始了艰难的寻根之行，而愈是深入了解，愈是感到历史对她们一家的不公，白人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也进一步得到了揭露，萨利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却变成了白人的“他者”，其对身份危机的焦虑感弥漫整个文本。

但是土著作家寻求个人、民族和文化的属性，强调历史的重构，并不是要用黑人的反话语来取代白人的历史叙事。他们“运用所谓‘白人的形式’来写本地的故事；不断把本土与侵略者的文化创造性编织成一体；跨越既定的记载，去掉固定的观点；用土著人所谓的胡说八道或屁话，将幻想和幽默相结合”[1: 264]。尽管他们认为保留土著文化传统十分重要，但同时也不否认与白人入侵者文化的共谋关系：土著人近200多年的历史与白人入侵者脱离不了干系，土著性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对于相互冲突和杂交性文化归属的认可。正如《沃拉迪医生的承受世界末日的良方》

里的同名主人公[1: 263]所说：“我们现在必须变得圆通活络一些，多找同盟军，而且认天命。”这种既没有一味批判白人，也没有完全姑息土著人自身弱点的态度，显示出土著作家宽容的胸怀和积极适应现实的灵活性，同时也表明他们对白人文化主导性的无奈和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某种认同。“土著作家就像门神一样，他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另一副面向未来，而他自己则存在于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1: 266]

土著作家使用“白人的形式”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叙事，一方面反映了白人文化的强势主导地位 and 土著文化的沉沦没落，另一方面也是土著作家反击白人文化的手段。他们使用白人的形式，语言也罢，叙述模式也罢，并不意味着范侬所说的“接受一种文化”[1: 237]，虽然“殖民者的语言包含着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它会制约人们的表达，使文化自卑情结阴魂不散”[1: 238]，但他们更多地使用白人的形式来表现土著民族本真性的内容，从而使土著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得以展现和传播，并在澳大利亚多元化的国度拥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在被“西化”的同时，也使殖民者了解到了土著民族的历史、神话和艺术传统。在控诉殖民者文化暴行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示了土著民族的坚韧与宽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土著作家的反话语——更加真实的历史叙事和民族叙事具有“逆他者性”，即利用殖民者的语言、叙述模式来反击殖民文化，使长期患有“失语”症的土著民族恢复了应有的声音。

毫无疑问，土著文学是澳大利亚整个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显示出了其勃勃生机。土著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对白人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不少作家如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托马斯·基尼利、戴维·马洛夫和亚历克斯·米勒等人都是从土著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富有澳大利亚特色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同时，土著作品的美学价值也日益被发现。虽然土著

小说的叙述模式多为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形式，但其内容已从单纯描述土著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对抗转向关注整个土著民族的命运、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如何与白人主流社会和谐相处的主题上来，并将土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土著的神话与传奇融入到现代文明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由于白人的殖民统治，土著民族长期处于文化落后的状态，他们的文学尽管在近二三十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白人作家相比，他们毕竟还是“欧洲都市文学传统边缘地区的居住者”[13: 591]。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浓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政治隐喻，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统一的存在体。当代澳大利亚白人作家、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逝去的历史进行了颠覆性解读，既延伸了文本的意义维度，也使文本写作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政治揶揄。尽管澳大利亚白人、移民和土著人在历史的沉浮中遭际迥异，但他们都忍受着“身份丧失”的痛苦，常常被殖民帝国描写成“他者”，并沦落到被人“凝视”的境地。澳大利亚白人被抛弃的历史，移民族群的背井离乡，土著人遭屠杀、驱赶的经历业已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因此，寻找文化归属、寻找家园，成了白人作家、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共同关注的主题。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白人文学、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在探讨相似主题时也彰显出不同的民族心理。虽然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白人作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回归本真性的历史责任感和仗义执言的道德操守，其作品也显露出对帝国文本的颠覆性和对土著民族、移民族群的同情，但他们更多地关注白人民族的历史叙事和与新旧帝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土著文化、移民文化充其量只是他们建构文化身份时所塑造的一个“他者”。一方面，他们与土著文化、移民文化结成同盟，以示与帝国话语的决裂，从而在历史的坐标中重新确立自我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在向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施舍同情之际，柔性地塑造一个“他者”

形象，以愈合内心深处遭帝国歧视的伤口，从而确立起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话语空间的主导地位。土著作家尽管在控诉和抵制白人殖民统治中表现出革命者的勇气，但由于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其呐喊声早已淹没在多元文化的喧嚣中。移民文学是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无根”文学，作家们努力将他们所经历的文化分裂转化为抚平裂痕的家园梦想和熨贴人心的抒情篇章，其非此非彼的文化认同常常使他们只能在童年回忆、悠悠乡愁中寻找归属与慰藉。也正源于此，澳大利亚白人文学、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张力和美学价值，并拥有不同的文学地位。

任何民族文学的发展都需要厚实的历史积淀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虽然近 20 多年来，澳大利亚白人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牢牢控制着其国内多元文化话语的主导权，但由于其文化土壤的贫瘠和“帝国知识暴力的挤压”，代表着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白人文学在世界文坛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民族政策的鼓励下，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蓬勃发展，但由于长期遭受白人文化的殖民统治和其文化的自身弱点，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的历史地位不可能与白人文学同日而语。移民文学长期患有“思乡”病，既无法摆脱过去，与白人文化融合，又受到土著文化冷落，成了无法落地生根的错位文化。土著文学更是势单力薄，白人文化对它难以认同，移民文化也了无兴趣，土著文学成了多元文化的第四世界。由此看来，澳大利亚各民族都面临“非殖民化”的共同任务，其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 盛宁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2] Bill Ashcroft. Against the Tide of Time: Peter Carey's Interpolation into History[A]. John C. Hawley. *Writing the Nation: Self and Country in*

- the Post-colonial Imagination*[C]. Amsterdam: Rodopi, 1996.
- [3]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M]. 杨乃乔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4] Elizabeth Webb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Patrick White. The Prodigal Son[A]. Leonie Kramer and Adrian Mitchell. *The Oxford Antholog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6] Bruce Bennett and Jennifer Strauss. *The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 Peter Pierce. Preying on the Past: Contexts of Some Recent Neo-historical Fiction [J].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1992, 15, (4).
- [8] 彭青龙. 写回帝国中心, 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5, (2).
- [9]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A]. Padmini Mongia.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ism Theory* [C]. London and New York: Arnold, 1996.
- [10]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 [11] Ken Gelder & Paul Salzman. *The New Diversity* [M].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Publishers, 1989.
- [12] Paul Salzman. *Elizabeth Jolley's Fictions*[M].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3.
- [13] 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4]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2nd Ed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15]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收稿日期: 2005-10-31

作者简介: 彭青龙(1967-),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澳大利亚文学。